

《都门纪变百咏》考论*

高春花

内容摘要:《都门纪变百咏》是庚子事变时期的重要典籍,组诗的两位作者瞿西复依氏与青村杞庐氏究系何人,一直悬而未决。笔者依据目前文献可确定这两位作者分别是夏曰琦与庄礼本,并对作者行迹略作钩稽,考订其生卒年。组诗采用的诗歌与纪事相结合的体例是庚子事变时期诗歌新制之一。两位作者为庚子事变之亲历者,诗中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载录及对社会百态的观照均具有史学价值与社会意义。对组诗的评价与定位不能离开创作背景、庚子诗歌史及诗体演进等因素,过高或过低都不合宜,这对庚子事变时期其他诗歌的评价与定位也具有参照意义。

关键词:《都门纪变百咏》 作者 学术价值 定位

《都门纪变百咏》是庚子事变时期重要的组诗之一,其史料价值已经得到认可,相关史书均有收录。但是本书的作者究系何人,长期以来一直视为悬案。笔者对此进行了详细考索并确定了组诗的作者姓名。另外,《都门纪变百咏》除了具诗史之用,在文学方面亦有重要意义,尤其是组诗采用的诗歌之下附录纪事的体例在庚子事变时期是非常典型的一种诗歌体式。只有将《都门纪变百咏》置于庚子事变诗歌的整体观照与宏观的诗歌发展背景之下进行考察,才能客观评价这组组诗在诗歌史以及诗体演进史等方面的地位与意义,也惟有如此,才能给这组组诗合适的定位与评价。

一、《都门纪变百咏》作者考

目前所见关于《都门纪变百咏》作者的著录大致有四种:

第一种题“瞿西复依氏 青村杞庐氏”。此种标注源于《都门纪变百咏》

*本文系黑龙江省教育厅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庚子词作的整理与研究”(1353MSYYB049)、教育部后期资助项目“庚子事变诗歌辑笺”(20JHQ036)阶段性成果。

清光绪石印本,《清代野史》《清代北京竹枝词》等皆如此标注^①。其中,《清代野史》将“嚻”题作“嚻”。复旦大学图书馆馆藏目录仅标注“嚻西复依氏”,后人引用时亦有只标一位作者的情况。

第二种题“复依 杞庐”,见《中国近代文学辞典》^②。《庚子事变文学集》目录采取此种标注方法,正文标注则与第一种同^③。

第三种题作“复依氏 杞庐氏”,《中国丛书综录》《中华竹枝词》等属于此类^④,国家图书馆与温州市图书馆古籍馆藏目录均如此著录。

第四种是不标注作者,《清朝野史大观》^⑤属于此类。

综观以上几种标注方法,都是在石印本标注的“嚻西复依氏青 村杞庐氏”基础上进行删改,涉及到作者的介绍大多摘自复依自叙,或曰作者不详,或曰“无从考证这两人的真姓名”^⑥。近日笔者在查阅资料过程中发现二则相关资料,可为查考作者提供线索。其一是《徐兆玮日记》中的一则记载:

后光绪庚子拳匪之乱,故友庄漱润、夏芍宾困守围城,同作《都门纪变百咏》,其体例与《咄咄吟》相同,特未知海滢山陬,尚有此类著述,未经发现否也。予藏有《咄咄吟》原刻本,嘉业堂本却未见。又《都门纪变百咏》余亦有石印小本,不知为夏、庄二人作也。^⑦

《徐兆玮日记》中清楚记载《都门纪变百咏》的作者是他的两位好友庄漱润与夏芍宾。姚光《与雷君曜书》中说“近蒙检惠庄漱润先生《都门纪变百咏》,谨已欣收”^⑧,亦提到作者为庄漱润。

另一则材料出自《嘉定碑刻集》。集中第九编《赠奉政大夫诸生夏锦书墓志铭》的注释中提到“夏曰琦有《都门纪变百咏》,与奉贤县举人庄礼(本)

①辜鸿铭、孟森等编:《清代野史》,巴蜀书社,1985年,第722页。路工编选:《清代北京竹枝词》,北京出版社,2018年,第102页。

②魏绍昌等编:《中国近代文学辞典》,河南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365页。该书记载《都门纪变百咏》序跋、诗歌数量等内容都不准确。

③阿英:《庚子事变文学集·序言》,中华书局,1959年,第7页。

④上海图书馆编:《中国丛书综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788页。雷梦水等编:《中华竹枝词》,北京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252页。

⑤小横香室主人编:《清朝野史大观》卷四,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8年,第149页。

⑥何芳洲:《都门纪变百咏——八国联军之役的史料》,论语社编:《过年日程》,上海书店,2015年,第67页。

⑦徐兆玮著,李向东等标点:《徐兆玮日记》第4册,黄山书社,2013年,第2802-2803页。

⑧姚昆群等编:《姚光全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376页。

合撰”^①,指出《都门纪变百咏》的作者为夏曰琦与庄礼本。之后,笔者在上海图书馆查到庄礼本存世的《濠隐存稿》,书后收录了二人合著的《都门纪变百咏》,题“嚆西复依氏 青村杞庐氏同著”。由此,可以断定《都门纪变百咏》的作者是夏曰琦与庄礼本。夏曰琦生于黄渡,在嘉定西南,嚆为嘉定简称,嚆西由此而来。青村属上海奉贤,庄礼本在其《濠隐存稿》中自题“奉贤庄礼本瘦岑”。所以,嚆西复依氏是夏曰琦,青村杞庐氏为庄礼本,“嚆西复依氏”“青村杞庐氏”是二人的号。

关于夏曰琦与庄礼本的现存资料不多,吉光片羽,考录于下,聊供查阅:

夏曰琦(1869-1918),生年见《清代硃卷集成》《嘉定县续志》著录,卒年见《黄渡志》著录^②。字朗霄,又字芍宾^③,号圃秋,夏锦书次子,出生于黄渡镇。清光绪十七年(1891)举人,考充景山官学教习,三年期满,由内务府引荐,奉旨以知县任用,指分江西摄吉安府通判、安福县知县。二十四年(1898),率先募资,为黄渡镇东西市购置外国救火设备。宣统元年(1909),被选举为黄渡镇和安亭部分地区咨议局议员、太仓州属常驻议员。预备立宪公会在各省筹备咨议局之际,在新马路梅福里开办“法政讲习所”,夏曰琦主讲《财政学》《刑法》^④。次年,被选为黄渡镇自治公所议长兼议员长^⑤。《法政学交通社杂志》第2号载其《述欧洲狱制之沿革》,署为“太仓夏曰琦”^⑥。

庄礼本(1866-1900),字漱润、瘦岑,奉贤人。生卒年主要依据两则材料推出,其一出自《郑逸梅选集》:“庄瘦岑歿于庚子闰八月二十三日。平生酷嗜黄仲则之《两当轩诗》,仲则年三十五而卒,不意瘦岑亦如之。”^⑦另外一则

①嘉定区地方志办公室、嘉定博物馆编:《嘉定碑刻集》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2159页。“本”字为笔者添加,原书漏写。

②顾廷龙主编:《清代硃卷集成》第186册,台湾成文出版社,1992年,第299页。嘉定县志编委会编:《嘉定县续志》卷十《选举志》,1983年,第3页。上海市嘉定县黄渡乡《黄渡志》编纂办公室编:《黄渡志》,1986年,第386页。

③有学者将芍宾著录为作者号,现据《上海府县旧志丛书(嘉定县卷)》订正(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上海市嘉定区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府县旧志丛书(嘉定县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2895页)。

④方平:《晚清上海的公共领域(1895-1911)》,上海世纪出版社,2007年,第227页。

⑤嘉定区地方志办公室、嘉定博物馆编:《嘉定碑刻集》下册,第2159页。

⑥上海图书馆编:《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录》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107页。

⑦郑逸梅:《郑逸梅选集》,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61页。

出自《姚鹓雏文集》：“杨几园称其诗极似黄仲则，年三十八而卒，亦适与仲则同。”^①。两则记载的相同之处是都说庄礼本去世时的年龄与黄仲则相同，但对于黄仲则去世时的年龄记载有异。目前所见资料记载黄仲则死于35岁，故用前说，存此备考。庄礼本庚寅岁（1890）应试礼部，这与高旭悼诗中所说“十年作客剑摩挲”^②时间吻合。《清史稿》记他：“拳匪初起，即以为忧。洋兵入城，痛哭不食，后以一恸而绝。”^③姚鹓雏称其：“怀才不遇，脏肮以歿……读其集，精警夷宕处，诚有近两当轩者。”^④有《濠隐存稿》存世，后附《都门纪变百咏》一卷。先生为一时名宿，高旭曾以诗奉质，受教于他，庄瘦岑对高旭亦推叹标举。庄礼本去世后，高旭撰有《庄瘦岑先生客死燕京哭以诗》《题庄瘦岑先生遗稿》^⑤。

二、《都门纪变百咏》成书考辨

关于《都门纪变百咏》的成书，作者在自叙中交代比较清楚，两位作者在庚子事变之时，困处都城“杜门息交，咫尺河山，益无聊赖”，在风声鹤唳、百无聊赖之时，“以小诗自娱”，之后将这些诗作略作编次，邮寄家乡，一是使“故乡人士，得悉危城近况”，一作“平安之报”。可见，这组组诗的写作目的，一为自娱，一为书信之用。而且，组诗写作的时间也不长，序言所说“积一月之久”，并非谦逊之语。从全诗来看，确实主要描述的是五月到六月中旬这一段京城的事情。

部分学者认为这组组诗记录庚子三月到九月之间的京师情形，此种说法渊源有自。“三月”出现在《都门纪变百咏》自叙、诗句、诗注中，计3处，分别是《自叙》中“庚子三月”、《马路》一诗“无端三月咸阳火”句、《初起》自注说“团民……今年三月间，流入京师”。第一处为作者回顾初入京之时的情境；第二处为作者使用“咸阳火”典故，项羽屠咸阳，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第三处则属回忆义和团初起之事，属于追述。八月的记录出现在《置闰》诗后注，“相传闰八月必不利于国家”；九月则出现在《家家》一诗后注，说“团众定期于七月初七日、八月十五、九月初九等日居民铺户一律不准举火”，属于日期的记录。所以不能只看组诗中出现的时间就遽下断语，需要仔细辨

①姚鹓雏：《姚鹓雏文集》杂著卷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827页。

②高旭：《庄瘦岑先生客死燕京哭以诗》，高旭著，郭长海、金菊贞编：《高旭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3页。

③赵尔巽等：《清史稿》卷四九五，中华书局，1977年，第13685页。

④姚鹓雏：《姚鹓雏文集》杂著卷下，第827页。

⑤高旭：《题庄瘦岑先生遗稿》，高旭著，郭长海、金菊贞编：《高旭集》，第13-14页。

别。至于说写到九月的记载就更不可能,两位诗人中的一位庄礼本在闰八月二十三日就已经过世。作者已经在序言中交代“积一月之久”,包括最后一首诗也写道“动魄惊心三十天”,与之呼应。所以诗歌前的自叙时间六月二十日应该就是诗歌完稿之时,百首诗歌,创作月馀,是实际情况。创作背景与创作过程都比较清楚,过多的阐释与生发反而会弄巧成拙。

《都门纪变百咏》成书后在当时就有流传,王曾祺《聊园诗存再续》收录《庚子行》一诗,诗下自注写道“顷阅近传《都门纪变百咏》注,衍为此篇,盖亦长歌当哭云尔”^①。后谢国桢《瓜蒂庵藏书总目》著录此书^②,刘咸忻评价该书“词虽未尽工而注细密,颇可观”^③,《近代文学大系》编纂时,孙文光曾建议增加《都门纪变百咏》,并认为其中“不乏佳作”^④。

三、《都门纪变百咏》的学术价值

《都门纪变百咏》百首组诗,虽非鸿篇巨制,却具有重要的文学与史料价值。

《都门纪变百咏》的文学价值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两位诗人是当时困守京城诗人群体中一员,是庚子事变诗人创作群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笔者目前查阅到撰写庚子事变诗歌的诗人约有二百馀家,这些诗人群体大体分三类:一类是困守京城诗人,一类是随扈诗人,还有一类是事变发生之时不在京城或避居他乡的诗人。夏曰琦与庄礼本属于第一类。庚子事变时期,困守京城的诗人作品有吴鲁《百哀诗》上下两卷、胡思敬《驴背集》四卷。还有高栢的诗歌,附录在《高给谏日记》中,《高给谏遗诗》也有收录。此外,延清也有《庚子都门纪事诗》《庚子都门纪事诗补》留存。从笔者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困处京城的诗人创作成果比较多,不乏大部头。《都门纪变百咏》在规模和数量上不能与大部头的作品相比,但是在考察京城诗人心境、创作、经历乃至交游等方面都是不可忽视的部分。

其次,《都门纪变百咏》采用诗歌与纪事相结合的体制,是庚子事变时期非常典型的一种诗歌体例。徐兆玮在日记中提到《都门纪变百咏》对《咄咄吟》体例的延续,也体现了这种典型性。这一时期的《驴背集》《庚子诗鉴》

①王曾祺:《聊园诗存再续》卷七,《清代诗文集汇编》第76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349-350页。

②谢国桢著,谢小彬、杨璐主编:《谢国桢全集》第8册,北京出版社,2013年,第423页。

③刘咸忻:《推十书增补全本》丁辑第2册,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508页。

④孙文光:《给〈诗词集〉提几个小问题》,范泉:《中国近代文学大系争鸣录》,上海书店出版社,2012年,第146页。

《百哀诗》《长安宫词》《庚子都门纪事诗》等诗集都采用了纪事与诗歌结合的体制。这在诗歌发展史上是非常突出的现象。从这个角度看,诗歌与纪事相结合是这一时期诗歌作品的显著特征,在收录此时期相关文献时不加说明地把诗歌小注直接删去或者直接将小注移到注释中,其实会失去或影响诗歌的部分精髓,是不恰当的做法。

《都门纪变百咏》的史料价值主要体现在两位诗人以亲历者的身份记录了当时困守京城的重要事件、重要人物以及京师百态:

首先,组诗记录了与义和团有关的事件,范围很广,包括义和团的兴起、法术、装束以及相关的坛事、坛例、供奉的神仙、发布的传单和朝廷的招抚等等。其中主要的事件如攻打东交民巷、火烧大栅栏等均有提及。

其次,组诗中涉及多位朝廷官员,如联元、李鸿章、鹿传霖、李秉衡、裕禄、增祺、毓贤、聂士成、立山等。这些人物或因殉难(联元、立山)、或因对东南互保的态度(李秉衡、鹿传霖)、或因为议和(李鸿章)、或因战功(聂士成)成为舆论的焦点。时至今日,对于其中一些人物的评价仍是史学研究的重点。比如对李秉衡的记录,诗注提到当时都中人称其“改节”一事,记录了当时的社会舆论,是评价李秉衡的重要信息。

再次,京师当时的社会状况亦据此可见一斑。组诗对京师干旱、官员府邸被占、眷属出京、无赖借机发洋财、查抄府邸之后的销赃、官员请假等均有生动的记录。尤其是其中记录的汇丰银行存银(《华俄》)、翡翠朝珠的售价(《故家》)、依据推背图将“交民巷”改“鸡鸣街”(《交民》)、“四大恒”(《深宫》)、欧墨新书对“写大字”的冲击(《辉煌》)等材料对研究银行业、当时的物价、城市街道的变化以及一些传统手艺的变迁等问题都是重要的史料。

《都门纪变百咏》仅是庚子事变诗歌中的一粒细尘,尚有大量的诗人与诗作没有进入研究视野,仅就笔者目前所整理的诗人而言,已多达二百余人,其中相当一部分诗人与诗作的研究还未开展。随着庚子事变诗歌材料的进一步整理与研究,学界对于这个特殊时期的诗歌会有更客观、全面的评价。

【作者简介】高春花,牡丹江师范学院教授。研究方向:近代战争文学、清代词学、清代女性文学。